



内蒙古党史资料

内蒙古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内蒙古党史资料

第一辑

内蒙古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 呼和浩特

内 蒙 古 党 史 资 料

(第一辑)

内蒙古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10千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775册

ISBN 7-204-00556-2/K·37 每册: 3.40元

发 刊 说 明

为了更广泛地征集、积累、研究和运用内蒙古自治区党史资料，促进我区党史工作的开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经自治区党委批准，由内蒙古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辑的《内蒙古党史资料》，于1988年第3季度创刊。本刊不定期出版，每辑20万字左右。

《内蒙古党史资料》刊载的主要内容有：新发现或未发表过的重要文献资料；回忆录；访问录；专题研究；党史人物介绍和传记，以及其他重要资料等。

《内蒙古党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遵循党中央两个历史《决议》，力求史实准确、观点正确。但是，有些资料由于客观历史条件限制和时间久远，现时尚难考证定论，加之作者和编者的见闻所限，或记忆有误，或者观点不尽相同，致使有的稿件的资料和观点难免会有不够准确之处。对此，我们热诚欢迎老同志、党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给予补充和订正。

出版《内蒙古党史资料》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艰巨复杂的工作，我们热切期望在内蒙古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同志、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提供所收藏的党史资料，热切期望熟悉内蒙古党的历史的同志踊跃投稿，热切期望区内外各级党史研究部门积极提供稿件，帮助我们办好这一刊物，使它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来稿来函，请寄内蒙古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1988年5月10日

发刊词

内蒙古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辟工作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内蒙古各族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夺取了内蒙古地区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创造了千古永存的光辉业绩，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

回顾党在内蒙古地区的光辉战斗历程，认真总结内蒙古地区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各级党组织更好地从内蒙古的地区特点、民族特点出发，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区蒙汉各族人民同心协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现实的意义。

丰富、准确的党史资料，是研究党史的基础，是党的宝贵财富。所以，《内蒙古党史资料》的编辑出版，是一件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

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经过党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尤其是一大批老同志积极参与党史资料的整理、研究、核实工作，我区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内蒙古党史资料》第一辑和以后陆续出版的各辑，将展示这些征集和研究的成果，以供党史工作者研究之用。同时，也为各级党政领导总结历史经验、指导当前工作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

素材。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和党性极强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从事于和热心于党史工作的同志，都应当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潜心研究，科学考证，认真整理，存真求实，立准立好党史资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内蒙古党史资料》是为党史工作者、党史爱好者以及广大党员、干部编发的。因此，希望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关注。在第一辑发刊之际，仅以此表达我的一点期望。

王 铎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

为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呕心沥血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乌兰夫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敬爱的周总理以他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为中华各民族的解放和振兴无私地贡献了一生。他的不朽业绩和卓越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我有幸青年时代就结识他，以后，我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和在国务院工作，又都在他直接领导下，由于他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创建和发展，对全国民族工作的开展，对各民族干部的成长格外关心，更由于他平易近人，待人以诚，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可敬可亲之感。在纪念周恩来同志90周年之际，他的很多往事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把一些印象最深的写出来，作为对敬爱的周总理的纪念。

民族干部的知心人

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是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我在中山大学作教学翻译工作。周恩来同志是乘到莫斯科参加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便，到学校来看我们的。1928年，是蒋、汪叛变，大革命失败的第二年，全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我们在莫斯科，欢呼过革命军北伐的胜利，也声讨

素材。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和党性极强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从事于和热心于党史工作的同志，都应当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潜心研究，科学考证，认真整理，存真求实，立准立好党史资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内蒙古党史资料》是为党史工作者、党史爱好者以及广大党员、干部编发的。因此，希望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关注。在第一辑发刊之际，仅以此表达我的一点期望。

王 铎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

目 录

发刊说明

发 刊 词..... 王 铎 (1)

纪 念 文 章

为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呕心沥血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 乌兰夫 (1)

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 乌兰夫 (12)

回 忆 录

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 吉雅泰 (21)

在大革命的年代里..... 勇 夫 (28)

内蒙古西部民主革命斗争的回顾..... 杨植霖 (40)

我跟随冯玉祥先生的一些经见..... 陈天秩 (73)

绥远小忆..... 赵鹏九 (98)

回忆抗战时期大青山地区的斗争..... 姚 喆 (102)

访 问 录

沿着党指示的方向走..... 奎 璧 (110)

我在冯玉祥部队的一段经历..... 方仲如 (119)

在我党帮助下的五原誓师经过..... 刘贯一 (123)

在地下斗争的日子里..... 李 森 (136)

铁窗内外..... 韩燕如 (148)

河套地下党斗争概况..... 王 森 (176)

谈谈我在绥蒙工作的简况..... 白如冰 (200)

党的政策促使了各民族的联合抗日..... 杨一木 (215)

抗日时期从事民族工作的回顾..... 刘 春 (228)

专 题 资 料

我党帮助冯玉祥并促成五原誓师的始末..... 罗 宏

孙忠耀 (247)

为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呕心沥血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乌兰夫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敬爱的周总理以他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为中华各民族的解放和振兴无私地贡献了一生。他的不朽业绩和卓越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我有幸青年时代就结识他，以后，我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和在国务院工作，又都在他直接领导下，由于他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创建和发展，对全国民族工作的开展，对各民族干部的成长格外关心，更由于他平易近人，待人以诚，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可敬可亲之感。在纪念周恩来同志90周年之际，他的很多往事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把一些印象最深的写出来，作为对敬爱的周总理的纪念。

民族干部的知心人

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是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我在中山大学作教学翻译工作。周恩来同志是乘到莫斯科参加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之便，到学校来看我们的。1928年，是蒋、汪叛变，大革命失败的第二年，全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我们在莫斯科，欢呼过革命军北伐的胜利，也声讨

过蒋、汪叛变。大革命失败了，今后怎么办？不少人忧心忡忡，大家关心着中国今后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周恩来同志又来看我们，我们自然心情很激动。周恩来同志和我们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关心地问这问那。他简要地给我们讲了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问过了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后，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希望我们学成回国为我国革命贡献力量。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是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在交谈中，有人告诉他，我和几个同志是蒙古族，他的目光马上集中到了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身上，并带着微笑说：“噢！你们是蒙古族，好极了！好极了！”这样格外关注，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有点拘谨，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过后我们都为没能给周恩来同志多说几句话而无不感到后悔。周恩来同志与我们交谈时的深沉目光和亲切关注，长久地回荡在我心底深处。我们想，周恩来同志为什么对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那么关注？很显然是把我们看作是少数民族的代表，着眼于整个蒙古族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他的关注，饱含着对我们的无限希望。此后，我经过反复思索，萌发出了请求回国，投身到国内艰苦而又炽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的想法。经过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意，1929年我回到国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辟和坚持地下斗争，后来又开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装的斗争。

时隔14年，也就是1942年，在延安又同周恩来同志见面了。这时，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周恩来同志是从重庆回延安来参加整风的。这次相见同第一次见面时比较，14年的艰苦岁月，使周恩来同志看上去老了一些，但他炯炯有神的双眼显得更加深沉，明快而有吸引力的谈话，表现出了随着阅历的加深，他更富有经验，更成熟了。见面后他就说：“云泽同志，你的情况王若飞同志已经给我讲过，我都知道了。”又说：“你回国后，在绥远地区做群众工作，做军队工作，还搞了百灵庙暴动和武装斗争，

特别是在斗争中培养出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干得很好嘛！”我说：“这些事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做的，特别是王若飞同志在绥远（内蒙古西部地区）期间，代表中央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重要指示和具体指导，过去工作中取得的这些成绩，是蒙、汉族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的结果。我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同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后来周恩来同志又说：“赢得抗战胜利还要进行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在危难中，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重，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在谈话中，周恩来同志提到一些内蒙古地区的人物，而且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基本情况都很了解。这说明周恩来同志很关心少数民族工作，很注意研究内蒙古的问题。

回想起来，周恩来同志对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的。早年的不必说，仅就50年代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他总促我发表意见，并很重视我的意见，就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记得1957年在青岛开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时，他已全面透彻地讲了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我不准备再讲什么了，可是他一定要我再讲一讲。于是我就讲了讲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几个关键问题。还有一次是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问题时，周恩来同志从历史到现实，从全国到广西，作了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的讲话，可是他还是要我再讲一讲，在他的促使下，我就按照中央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集中讲了把原广西省的行政区域全部划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周恩来同志对我这两次发言都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所以能为人民做些事，都是党培养的结果，这当中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是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感动，终生难忘。“文化大革命”中，我长期被“监护”，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前，经过周恩来同志多方努力，解除了对我的“监护”，恢复了自由，让我回到了北京，

事后我了解到，周恩来同志为了让我参加十大并选为十届中委，曾据理力争，纠正和批判了说我“反党叛国”、“搞分裂”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他特意把1945年10月中央派我去苏尼特右旗解决那里搞起的一个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说成是“单刀赴会。”并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他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周恩来同志是冒着很大风险伸张正义的。“四人帮”给我强加了“反党叛国”的罪名，本欲置于死地。如果不是周恩来同志的保护，还不知葬身何地，更谈不上重新出来工作了。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我，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这是对一个民族干部的信任和爱护，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同志坚持党的原则，无私无畏、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德。每想到这件事，我都感到对周总理有一种无法报答的感激之情。周恩来同志对我的这种关心和爱护，远远超出了我个人，而是对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爱护。

执行民族政策的楷模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基本政策是经过长时期探索、酝酿才形成的。我党充分考虑了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点，深刻分析了我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感情上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在近代革命中，中华各民族为反对共同敌人，更是团结一致，生死与共，各自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实际情况。从既维护国家的统一又让少数民族在各自的地区当家做主出发，英明地提出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中，周恩来同志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建

立，是党的这一基本政策的第一次实践，而1947年3月23日中央批准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的电报指示，正是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央集体决定精神亲自起草的。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我国大部分地区尚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内蒙古也只是解放了东部大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确立和实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内蒙古自治区，对增加我国革命力量，推进解放战争，扩大解放区，加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了我们党的政治远见和革命胆识，而周恩来同志起草的中央电报指示，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电文中，除表示同意建立内蒙古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外，并明确指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并非独立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它所反对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独裁政府，及其取消民族自治权利的伪宪法和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同时，对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党的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斗争，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其它问题，都做了明确指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这一电报指示精神，制定了自治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它不仅为解决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革命发展中解决全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取得了经验。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的这一电报指示，为后来不断充实完善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同志被誉为这一基本政策的奠基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周恩来同志一向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划定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时，他的作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947年5月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时，虽然中央对其辖区已有总的设想，但那时我们只控制着内蒙古东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客观上还不可能形成真正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内蒙古地区陆续解放，明确内蒙古行政区域的问题就提到了日程上。早在1949年初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就议论了这个问题。当时，周恩来同志曾把我整理的一个内蒙古基本情况的材料批发给与会同志。毛主席提出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逐步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自治区领导机关先由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待绥远解放后移归绥。按照毛主席这一意图，中央确定了内蒙古的行政区域。这一意图的含义很明确，就是撤销热、察、绥三省，形成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彻底改变国民党反动派及历代统治者对内蒙古实行分割统治的状况。这样做既符合内蒙古的历史情况，也符合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和有关地区各民族的利益，深受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当时也有少数人不理解，以种种借口拖延这一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同志深知各族人民的心情，坚定地贯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意图，并为贯彻实施这一意图，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毛主席，一见面他就问我，你搬家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搬。毛主席听了感到奇怪地说：“怎么！你们还住在张家口！”我说还有人不理解，需再做做工作。毛主席对此非常坚定。我也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说：这个问题是中央已经定了的，毛主席也说过，按中央定的、毛主席说的办，我再做做工作。经过周恩来同志多次耐心的谈话，做通了有关同志的工作，这个问题才得到了圆满解决。1952年夏天，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由张家口迁到了归绥（呼和浩特）。后来又在周恩来同志的关心和主持下，经过几次区划调整，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做到了毛主席说的“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十年浩劫中，林彪和“四人帮”倒行逆施，把一个好端端的自治区划了个七零八落，破坏了已经恢复的“本来面貌”。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要我就此给中央写了个专题报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中，“本来面貌”才又恢复。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单纯是个区划问题，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为全国各少数民族所注目，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内蒙古自治区。

周恩来同志重视民族工作，认真执行坚决捍卫党的民族政策的典型事例很多。在这无数事例中，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这就是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根本不承认民族工作，把中央一级所有民族工作机构都一扫而光。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大量有关民族工作的问题无人过问，长期下去是很危险的。周恩来同志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他已病入膏肓，但却放心不下。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他经过多方面考虑，下决心提出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一个民族政策研究小组，并且提出“组长还得乌兰夫同志当”。这个研究小组建立后，我当然不能辜负他对我的关心和信任，要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当时连我在内这个组只有7个人，虽然那时“四人帮”在台上，我们的工作很难做。但是，毕竟有了一个民族工作的机构，不管怎么样，这方面的问题总是有地方管了，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逐步恢复民族工作机构，正常开展民族工作创造了条件。后来中央任命我为中央统战部部长，我也就把这个组的同志带到了中央统战部，使得我们的民族工作得以连续进行。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政策研究小组，是周恩来同志为我国民族工作尽的最后一把力。这最后一把力，谁知道周恩来同志花费的气力要比正常情况下大出多少倍呀！更何况这是他最后的时刻！这件事办过后没有多久，周恩来同志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我向他遗体告别时，回忆着这件事，回忆着他关心民族工作的无数事例，不禁默默地落泪了。

为少数民族发展呕心沥血

旧中国各少数民族都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内蒙古的情况也不例外，特别是居住在广大牧区的

蒙古族，经济、文化水平低，疾病流行，人口下降，生活极为悲惨。解放后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内蒙古牧区提出了“人畜两旺”的口号。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中央和全国各省市给予有力支持和全面支援。这种支持和支援正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过问、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现在内蒙古的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历史上的悲惨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周恩来同志为此付出的心血却永远留在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记忆中。

50年代初，为了解除内蒙古牧区群众的病痛，制止人口下降，开展过一场消灭梅毒病的驱梅斗争。那时国家还很困难，为了支援驱梅，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从中央和一些省、市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组成驱梅队派往内蒙古牧区，同时还调进了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保证驱梅需要。在中央和有关省、市支援下，经过驱梅队医务人员的艰苦奋战，内蒙古牧区的梅毒病很快得到控制，仅短短几年就把给牧区群众造成灾难，危及蒙古民族生存的梅病消灭了。这一给内蒙古草原和整个蒙古民族带来欢乐和幸福的胜利，内蒙古人都知道，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关心和指挥下取得的。

3年困难时期，全国食品缺乏，大家都在为如何渡过困难积极想办法。1959年底，我在北京开会遇到了康克清同志，她对我说，上海和华东其他几个城市有些孤儿，由于食品不足很难办，问我能不能想办法帮助一下。我说：“可以。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送奶粉，能解决孩子们多少时间的问题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康大姐，你看怎么样？”康克清同志觉得给牧民抚养的办法好，当即表示赞成。后来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年初他问起了我，我把与康克清同志商量的意见和内蒙古接收、安排的